

# “收入倍增”并非必然有肉吃

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,绝非是给社会上每个人的工资增加一倍。而是国家努力将“市场蛋糕”做大,在这个做大的过程中,那些付出更多的人,有望得到更多。

在北京打工的童丽娜,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00元。这样的收入,在北京应该说处于低收入水平。从报道中可以看出,她在北京生活的艰难,吃不起肉,生不起病。她对未来的“收入倍增计划”抱有好奇心。(据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)

吃得起肉,这样的要求,若放在30年前的中国,应该是奢侈的,但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下,放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北京,应该说这不是奢望。

从报道中可以看出,这位年轻的90后,是刚刚走上社会,刚刚找到谋生的手段。她到北京之初,很是激

动,先是在火车上一夜未眠,然后是游览了北京的几乎所有景点。在身上的钱快花光的时候,开始找工作。在遭遇了一些坎坷之后,她发现,到了北京,并不意味着实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。这个让她激动的北京,对她而言,吃肉都是奢侈的生活。

是的,肉不会从天而降,到了北京,并不代表能够过上“北京的生活”。在北京游玩,与在北京谋生,是完全不同的感受。

在童丽娜的心目中,月收入8000多元,在北京才能过上不错的生活。但事实上,相对于动辄数万元的房价,即便月收入达到1万元,

也未必过得不拮据。

那么,童丽娜们,如何能够顺利地吃上肉呢?

其实,大量的“北漂”,除了那些家庭条件好的人们,当初来到北京,都是从低收入开始起步的。所以,刚开始的时候,吃不上肉,并不可悲,也是正常的。

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工,在大城市,谋得一份工作,目前的条件下,并不困难,解决温饱可以说相对容易。但要想过得更好,经常有肉吃,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了:踏实工作,用心工作,学得一技之长,逐渐将“凭体力吃饭”变为“凭技术吃饭”。

所谓的技术,其实并非

是多么尖端的要求。做农民是有技术含量的,做农民工,当然也有技术含量。无论是在餐厅当服务员,还是在大街上当清洁工,其实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。所谓有技术含量,就是用心做比应付做会做得更好。

像北京这样的城市,有大量以低收入起步的外来务工人员,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,都有值得尊敬的贡献。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多年的奋斗,收入水平绝对不亚于那些在写字楼工作的所谓白领,甚至远远超过童丽娜认为遥不可及的8000多元。

童丽娜最值得关注的

一句话是:“将来,我不知道国家能怎么帮我这样的人群实现收入倍增。”

在市场经济环境下,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,绝非是给社会上每个人的工资增加一倍。而是国家努力将“市场蛋糕”做大,在这个做大的过程中,那些付出更多的人,有望得到更多。

打个不恰当的比方,收入倍增计划,将会使得市场上提供更多的肉,但是,这不意味着每个都可以吃更多的肉,但这为每个人吃上更多的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实现这种可能性,更多靠每个人的争取和努力。

□王海涛(北京 媒体人)

# 谨防经济再“过热”

日前,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某财经论坛上表示,“中国经济始终有过热的冲动,政策要始终保持对通胀的关注。”

眼下,各地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,出于对政绩的追求,势必会加大各种项目的上马。可以预期,若经济增长导向没有明显改变,2013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像2003年那样,快速迎来经济过热的周期,而这轮周期,必以汹涌的固定资产投资急升和银行信贷扩张为核心。

目前,不少地方政府明显加快了通过税收奖励或返还的方式吸引项目。而自上半年以来,在稳增长号召下,发改委启动了一系列的大项目,到明后年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已经“棋至中盘”,想必届时全国又会到处是工地,重化工业投资热、房地产热此起彼伏。

在过去十年,中国经历了数波高速的信贷扩张,由此制造了两大过热投资领域:一是重化工业投资热,钢铁厂、水泥厂等遍地开花,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;二是房地产热,先是京沪广深,后有二三线城市,到今天已经是蔓延至偏僻的小县城。不管是信贷GDP比、广义货币等指标,还是投资规模占GDP比,都早已经严重预警了旧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。但经济转型这些年一直停留在纸面,未见明显改观。

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旧模式,其根源正如周小川所言,“中国处于转轨经济中,企业及地方政府财务软约束长期存在”。这意味着,在“软约束”之下,不管地方政府是否具备财力和能力建设该项目,因政绩的冲动,地方政府都要上马项目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,就如周小川所言,“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,主要是希望能够放松货币供应量,能够更大地促进经济发展。”这也是造成过去中国货币一直处于滥发状态,“事实上货币紧缩”从未出现的主要原因。

而地方政府发展GDP的冲动如此激烈,与分税制带来的“分灶吃饭”格局密切相关。因为地方政府只有把GDP做大了,才能增加财政税收。上重化工项目,发展房地产,拉大企业和大项目,更是提高自身财政收入的不二法宝。

犹记得2004年一季度,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然跃升到43%的峰值,那是那轮经济过热的巅峰时刻。现在,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大的勇气与旧模式作别,重新理顺地方和中央的财权、事权关系,去除房地产泡沫,减税以还利于民间,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,激发民间创新活力。这才是中国经济转型首要解决的问题。

□倪金节(财经作家)



新京报漫画 许英剑

# 居民收入翻番需先让企业“吃肉”

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赚钱,这不仅是对经济环境设定的考验,同时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模式的淬炼。

十八大报告针对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内容引起社会各界关注,而对于一个从江西老家到北京就业的90后小姑娘而言更重要的是每天都有肉吃。诚然对于一个月收入1100元、实际到手只剩800多元的人来说,收入翻番并不是什么太具诱惑力的话题,正如小姑娘自己所言只有当上经理月入3000才能过起吃肉的日子。

企业是人的集合,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群体存在着明显而强烈的收入增长需求,那么势必意味着企业也将遇到同样的问题。如果深思下去,小姑娘工作

的餐厅为什么开出显然违背北京最低收入标准的薪资,这或许隐含着餐厅本身也出现了生存危机。近两年人力成本上升是中国大部分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,沿海部分传统制衣行业薪酬甚至出现了200%的增幅,同时还需要面对租金上涨、员工配套设施建设等要求。

显然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赚钱,这不仅是对经济环境设定的考验,同时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模式的淬炼。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,如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针锋

相对的经济政策,其实可用“面违心和”来概括:奥巴马的富人增税、穷人减税方案虽然能够博得更多选民支持,但如果富人到达赚钱边际,则很有可能前往其他地区投资,使穷人实际上失去赚更多钱的机会;同样道理,罗姆尼希望通过给富人减税吸引更多本土化投资,冀望不仅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够输出更多财富给穷人。但收入分配是无法完全公平的,此举虽有助于改善穷人收入,但前提必然是富者恒富、穷者更穷。因此实际上走到最后,对于这两人的政策很大的可能仍然

是殊途同归。

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,中位数收入以下群体为整体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,与人均收入翻一番相比,笔者更重视的是收入分配问题:如何让中位数以下群体获得更多的收入分配权,同时还要保障企业的生存空间。有句老话叫做“赔本赚吆喝”,但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持续干这样的“傻事”。或许目前遭遇生存瓶颈的很多企业过去积累了足够财富,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们在此时回馈社会,去干违背经济规律的事。

因此,在笔者看来想要让企业更好的生存,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,并给予愿意将更多利益分配给员工的企业税收优惠;同时,逐步提升最低收入标准,并严格执行监管、监察制度。我们曾经利用优良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精英回归境内,现在我们需要拿出同样的政策来吸引和鼓励基础从业者,并提供良好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规划辅助。有了宽松的政策再加上严厉的监管,收入分配结构才能趋于合理,居民收入翻番也就指日可待了。

□温晓东(北京 财经评论人)